

清前期滇军入藏与川滇藏 协同发展格局的形成

周智生 李 铭

为了实现大一统格局下蒙藏地区的“长治久安”，在清廷的统一调度下，云南调兵筹饷直接参与了康熙时期“驱准保藏”、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和平定阿尔布巴反叛等三次军事行动。文中对于历次滇军入藏的组织过程及行军路线、后勤供应及其影响等史事进行了梳理和呈现。滇军入藏既是清廷在大一统政治格局中加强边疆治理的重要举措，也是保证川滇统筹协调安藏的基本前提，由此拉开了川滇藏安防一体建设的序幕。滇军三次入藏支援平叛，不仅维护了边疆安定，而且对于加强滇藏交通建设，促进滇藏贸易发展，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起到了桥梁和纽带作用，对滇藏关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关键词：统筹治藏 川滇藏安防格局 滇军 滇藏关系

作者周智生，《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教授。地址：昆明市，邮编 650092。李铭，中央民族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地址：北京市，邮编 100081。

清代康雍乾三朝多次用兵平定西藏内乱外患，逐渐巩固了对西藏地区的统治。滇军在朝廷统一调度下直接参与了这些军事行动，为实现安藏稳藏发挥作用，成为支撑清政府对西藏施行有效治理的重要保障力量。目前学界有关清代滇军入藏的有关论述多散见于其他问题的专题研究之中，^①其整体历史事迹因专题所限，还未能深入展开具体梳理和讨论。

清代滇军入藏，不仅是清代西南边疆治理中的大事件，而且对于清廷和地方大员重新认识并评估治藏方略，构筑统筹治藏格局，处理川滇藏三地边务治理，均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为

^① 如王恒杰、邓锐龄、冯智、喜饶尼玛等学者有关清代藏区治理史的研究，参见王恒杰：《迪庆藏族社会史》，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5 年版；邓锐龄：《1720 年清军进入西藏的经过》，《民族研究》2000 年第 1 期；邓锐龄：《年羹尧在雍正朝初期治藏政策孕育过程中的作用》，《中国藏学》2002 年第 4 期；邓锐龄：《岳钟琪与西藏问题》，《中国藏学》2004 年第 3 期；冯智：《云南藏学研究：滇藏政教关系与清代治藏制度》（上、中编），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7 年版；冯智：《中甸在清初勘界暨治藏中的地位》，《中国藏学》2009 年第 1 期；喜饶尼玛、王维强主编：《西藏通史 清代卷》（下册），中国藏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等。李凤珍、西绕云贞、黄辛建等关于川滇藏行政区划的研究，参见李凤珍：《清朝对西藏与四川、青海、云南行政分界的勘定》，《西藏研究》2001 年第 1 期；西绕云贞：《天下一同的重要决策——迪庆藏区归滇研究》，《西藏研究》2003 年第 3 期；黄辛建：《雍正时期藏区行政区划研究》，《中国藏学》2018 年第 3 期等。赵心思、张欣等有关滇藏交通史的研究，参见赵心思：《吐蕃入滇与滇藏交通的发展》，《西藏研究》2006 年第 2 期；张钦：《〈藏行纪程〉所载滇藏交通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 年第 1 期等。孙宏年、周智生等关于清代藏区军事格局变动的研究，参见孙宏年、苗鹏举：《清代西藏地方军事地理格局的演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 年第 3 期；周智生：《清末川滇边区的联防与联治》，《历史研究》2019 年第 6 期等。

此,本文通过整理朱批奏折及进藏官员的记录等相关史料,立足于前人研究,对清前期滇军入藏组织过程、后勤保障、行军路线等情况进行了全面梳理,并重点讨论滇军入藏在清前期整体治藏格局中的战略地位、推动川滇协同发展的历史影响等问题,以期学界进一步认识清代大一统政治格局中省际互援实现边疆统筹治理提供历史案例和研究导引。

一、滇军入藏的组织过程

(一)康熙末年滇军入藏参与“驱准保藏”

顺治年间,清廷通过对五世达赖喇嘛和固始汗的册封,确立了对西藏地区的主权。然而这一时期清政府对西藏仅维系着宽松的羁縻统治,在西北野心勃勃的准噶尔部随时想要南下染指该地区。康熙五十六年(1717),准噶尔部的策旺阿刺布坦派兵偷袭西藏,攻入拉萨并杀死拉藏汗,西藏陷入混乱。康熙帝闻讯后决定出兵援藏,然大军兵败于哈拉乌苏,全军覆灭,清廷首次对藏军事行动以失败告终。

为平定西藏之乱,斩断准噶尔对西藏的控制,康熙帝决定再次组织陕、蜀、滇三路兵马联合进藏。于是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滇军入藏的前期战备开始着手规划。康熙五十六年清廷令都统和礼赴滇“预为防备”,^①次年钦差和礼等至滇,会同云南军政大员巡查金沙江要口。此次巡边主要目的是探寻进军线路和“耀兵蒙番”。五十八年二月,都统武格、副都统吴纳哈等领江宁、杭州满兵二千名进驻滇省,听候朝廷调遣。时有客卿建议调兵运饷先行驻江卡拉城(即天柱寨),“遇有呼吸机宜,兵精粮足,可以先锋,可以援剿”,然遭武格反对而作罢,“但拨运米七千余石,备贮中甸……并分购牛只,以备出口塔城关之用”。^②备兵期间,云南清军在中甸外的扎杂、奔子栏等地驻兵侦察敌情,并派兵接应由都统法喇率领的驻巴塘川军。^③

清廷议定进军西藏平叛后,由抚远大将军允禩驻西宁(后移驻木鲁乌苏)统领军务与粮饷,大军分南、北、西三路。西路从青海进藏,由宗室延信率一万二千名满蒙汉官兵以及部分青海王、台吉护送六世达赖进藏;南路从巴尔喀木进军,由四川和云南两支组成,定西将军噶尔弼统领进藏;北路以驻巴尔库尔和阿尔泰两支军队深入准噶尔边境以牵制敌后。^④

属于南路方面的滇军于康熙五十九年二月,由都统武格、副都统吴纳哈、鹤丽镇总兵赵坤等率军由剑川北上。滇军进藏兵马以江浙满兵一千,云南鹤丽、永北二镇绿营兵二千及丽江土兵五百组成,此外还有云南提督张谷贞率兵驻中甸,居中策应。^⑤六月,川滇两路清军在“渣牙会兵”。^⑥有关南路川滇军会师后的进军过程,前辈学者已有详细梳理,^⑦此不重述。九月,清军入藏南北两路大军在拉萨集结,西藏迅速底定。大将军允禩在各路中挑选了部分官兵驻守

① 《清圣祖实录》卷274,康熙五十六年十月乙巳,《清实录》,中华书局1985—1986年影印本,第6册,第690页。

② (清)倪蜕辑、李埏点校:《滇云历年传》,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62、563、565页。

③ 《清圣祖实录》卷284,康熙五十八年六月丁巳,第6册,第776页;卷285,康熙五十八年七月癸酉,第6册,第778页;卷286,康熙五十八年十二月庚戌,第6册,第790页。

④ 《清圣祖实录》卷286,康熙五十八年十二月辛酉,第6册,第792—793页;卷287,康熙五十九年二月癸丑,第6册,第798页。

⑤ 《清圣祖实录》卷287,康熙五十九年三月己丑,第6册,第799—800页。

⑥ (清)倪蜕辑、李埏点校:《滇云历年传》,第566页。

⑦ 邓锐龄:《1720年清军进入西藏的经过》,《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

西藏,其中云南一路留赵坤领绿营兵三百名留驻,其余撤回原籍。^①康熙帝认为“藏地甚属紧要”,后又加派了驻滇的江浙满兵五百名和四川绿营五百名进藏。^②故云南一路驻军由云南绿营三百及驻滇江浙满兵五百组成,驻军人数仅次四川,是当时清廷驻藏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六十一年六月,滇军首次驻藏任务结束,赵坤领云南绿营回滇。^③雍正元年(1723)五月,江浙满兵也由副都统吴纳哈率领撤回云南,旋归原籍。^④

此次滇军入藏过程中,还动员和组织了土司土兵的力量。如丽江土知府木兴主动请缨,实派土兵一千名援剿。木兴本人总理军务,并亲领五百名开路护饷,其子木崇领兵五百“随师进征,另在钦差大人伍标下听遣,以作先锋”。^⑤当时大军经滇西北进藏道路异常艰险,一条“多夹坝,高山大川”,另一条则“高坡峻岭,鸟道羊肠,几非人迹所到”。^⑥若没有熟悉地情的土兵向导,满、汉大军很难迅速安全抵藏。丽江土兵熟悉地情、吃苦耐劳,“沿途帮安台站,搭造桥舡,把守要渡,侦探向导,护军粮饷”。作为进藏大军的前锋,木氏出力甚巨,木崇在“随师进征”中亦染疾身故。^⑦

(二)雍正年间滇军入藏

1. 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

“驱准保藏”成功后,清廷废除了第巴制,代之以西藏贵族组成的噶伦政府来管理西藏政务,和硕特蒙古汗王对西藏的统治由此结束。雍正元年三月,驻藏清军奉旨内撤,固始汗之孙罗卜藏丹津企图借机恢复其父祖辈在西藏的统治地位,遂趁清军内撤,在青海发起叛乱。

有关青海谋叛的情报,云南方面较早获悉并迅速采取了若干应对措施。雍正元年四月,云贵总督高其倬就收到驻守西藏的蒙古将领策旺诺尔布发来的蒙古文密信,内称罗卜藏丹津计划于十月传集西海诸部会盟,并以立汗“无望了”来煽动各部勾结谋反,更声称要将打箭炉至喀木、卫藏等地俱行占据。高其倬认为其情真假未可定,但不可不预为防备,他一面谨慎知会川、陕各方暗中侦探,一面加紧筹划滇西北毗邻西藏地区的军事防御和粮饷事宜。军事防御上,高其倬认为“云南口外之中甸、阿墩子俱系进藏要路”,原各驻兵两百,“力量稍单”,故“以巡防为名”,调鹤丽镇剑川协兵丁三百入驻中甸;又令永北镇备兵三百、楚姚镇二百、鹤丽镇五百,“倘有信息”即由鹤丽镇总兵郝玉麟带领此预备兵丁一千,及中甸、阿墩子驻兵七百出口“相机接应”;粮饷筹备上,令鹤庆运米一千至阿墩子,顺宁运米一千八百石及青稞一千石至中甸。^⑧云南方面较早获悉青海将叛的消息,^⑨并随即采取了一系列颇具前瞻性的防备措施,显示出当时云南官员对西藏、青海形势的高度敏感和关注。

① (清)倪蜕辑、李埏点校:《滇云历年传》,第567—568页。

② 《清圣祖实录》卷291,康熙六十年三月己丑,第6册,835—836页。

③ (清)倪蜕辑、李埏点校:《滇云历年传》,第568页。

④ 《江宁副都统吴纳哈奏报自藏撤兵返抵云南日期折》,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五日,《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上册),黄山书社1998年版,第381页。

⑤ ⑦ 张永康、彭晓主编,云南省博物馆供稿:《木氏宦谱·图谱》,云南美术出版2001年版,第143页。

⑥ (清)杜昌丁:《藏行纪程》,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41页。

⑧ 《云贵总督高其倬奏筹备滇藏边境防务折》,雍正元年四月初五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第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18—221页。

⑨ 北京最初于雍正元年三月下旬获悉罗卜藏丹津勾结准噶尔谋叛的消息,但直到四月雍正帝仍不相信青海将叛,仅令各方暗中侦查。参见《侍郎常寿奏报防备罗卜藏丹津阴谋叛乱折》,雍正元年三月十八日;《署理抚远大将军印务延信奏报接奉御批折》,雍正元年四月十二日,《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上册),第52—57页。

由于青海各部的向背情形尚不明朗,清廷也一直在观望,直到九月年羹尧上书朝廷:“罗卜藏丹津肆行无忌,非用兵不可。”^①他建议朝廷令川、滇两省扬言发兵进藏,一边又致书青海陈说利害,并招抚晓谕各部以孤立叛军,为来年春出兵平剿争取备战时间。^②年羹尧的建议获得清廷认可。为了防止罗卜藏丹津窜入卫藏,十月,清廷命松潘镇总兵官周瑛领两千川兵自察木多进藏,令云南提督郝玉麟领兵接续驻防察木多。十二月,郝玉麟遵旨领兵渡金沙江出口,雍正二年正月初六到达中甸,并将时由青海和硕特部强占的中甸收归云南。^③二月初八日,郝玉麟率两千滇兵经中甸进驻察木多,并调丽江土兵二百余名随营遣用,由鹤丽镇副将孙弘本领兵五百名接防中甸。^④由于中甸至察木多相离尚远,高其倬又根据郝玉麟的建议,从迤东各营调兵七百名赴阿墩子一带,“以备提臣(郝玉麟)调度”,并将阿墩子、天柱寨沿线台站恢复驻兵,与进藏滇军“声势相接”,这样既能应援西藏,又能保滇藏边区无虞。^⑤滇军四月初抵达察木多时,青海前线的战事已基本结束。考虑到察木多乃通藏要路,清廷命滇军暂留一千驻扎察木多,既以扬威亦可声援藏内。八月,郝玉麟领其余滇军回省。^⑥雍正五年,滇军将负责川滇藏勘界的钦差鄂齐护送至川军驻地革达后,由鹤丽总兵张耀祖带领撤师回汛。^⑦

滇军此次进军过程中缉拿奸细、探听军情,沿途招抚了中甸、擦瓦岗等处的部落,晓谕安抚各头人喇嘛,并赏给财物,又授原营官、头目以外委、守备、千把等官职。^⑧郝玉麟部招抚中甸后,高其倬随后派顺宁知府范溥前往中甸清查户口、钱粮及四至,着手在该区屯垦。^⑨滇军入藏沿途还接连招抚了原属青海蒙古的洛隆宗及奔打至常川一带的各部落。^⑩

2. 平定阿尔布巴之乱

雍正初年西藏事务由噶伦康济鼐、阿尔布巴、隆布鼐及扎尔鼐等共同办理,但政出多门,派系斗争不止。来自后藏的康济鼐尤其受到阿尔布巴等前藏贵族的排挤。雍正四年六月,钦差鄂齐奉命赴藏升康济鼐为首席噶伦,更加激化了噶伦间的矛盾。雍正帝得知诸噶伦不和后,令内阁学士僧格、副都统马腊等先驰赴藏,以安其众。五年六月,未及僧格等抵达,阿尔布巴等人便合谋将康济鼐杀害,康济鼐的下属颇罗鼐集结后藏军队为康济鼐复仇,由此引发了卫藏地区大规模战乱。交战双方均奏请朝廷出兵,八月,雍正帝获悉康济鼐被害后即决定派陕、蜀、滇各方兵马进藏。^⑪随后又担心发兵会迫使噶伦畏罪携达赖投奔准噶尔,故九月又下谕称康济鼐

①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前往西宁料理边务折》,雍正元年九月十八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第1册,第972页。

②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明料理西海军务情形折》,雍正元年九月十一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第1册,第926页。

③ 《云南提督郝玉麟奏报驻扎中甸情形折》,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一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册,第519—523页。

④ 《云贵总督高其倬奏报提臣郝玉麟带兵前往察木道日期折》,雍正二年二月十八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册,第610页。

⑤ 《云贵总部高其倬奏遵旨调员带兵进驻中甸折》,雍正二年正月二十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册,第517—518页。

⑥ 雍正《云南通志》卷16《兵防》,乾隆元年刻本,第89页。

⑦ 《云南鹤丽总兵张耀祖奏报遵旨带兵回汛并请陛见折》,雍正五年二月十三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9册,第97页。

⑧ 《云南提督郝玉麟奏报驻扎中甸情形折》,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一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册,第519—520页。

⑨ 《云南总督高其倬奏中甸田地可开垦折》,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九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册,第881页。

⑩ 《云南提督郝玉麟进抵擦瓦岗拿获奸细安抚彝民折》,雍正二年三月二十六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册,第719—722页。

⑪ 《清世宗实录》卷60,雍正五年八月戊申,第7册,第922页。

被害为噶伦内讧之“小事”，不必用兵，令各路兵马停止预备。^①

十一月，随着藏内斗争形势逐渐明朗，^②雍正帝再次决定出兵，仍以陕、蜀、滇三路兵马协同进藏。^③十二月初，云南接上谕：“于来年四五月间发兵定藏”。^④云南据此派开化镇总兵南天祥、剑川协副将李宗膺等率兵三千余员，前往察木多与川军会合。^⑤云南大军于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在剑川集齐，另派丽江土兵通事二百名、中甸番兵五十名随营前进，四月初八从剑川出口经中甸前往察木多，六月十三日川滇两军在察木多会师。随后，驻察木多清军获悉颇罗鼐已于五月二十六日领兵进驻拉萨，并控制了阿尔布巴等人。根据藏内局势的新变化，四川提督周瑛重新调整了进军西藏的计划：滇军由南天祥领一千驻察木多、李宗膺领二千进驻洛隆宗应援，自己领一千川兵驰赴拉萨。^⑥

八月，清军抵藏处决贼首，并料理善后完毕，川陕兵丁各留一千驻藏，其余分五队分别撤回原处，并护送达赖喇嘛随军移驻理塘。驻察木多云南兵丁照旧留一千“于藏兵未撤之先，暂令驻扎，以便应援”，^⑦其余滇兵于雍正七年正月由南天祥领回云南。^⑧九年，驻藏官兵例行换防，“查木道系通藏之要路，且与滇省相近，仍遣云南兵一千前往驻扎”。^⑨十一年三月，雍正帝谕办理军机大臣等：“西藏驻扎弁兵，本为保护唐古特人等，以防准噶尔贼夷侵犯而设。彼来贼夷大败，徒步奔逃，力蹙势穷，不能远涉藏地，则其无力进兵可知。且颇罗鼐输诚效力，唐古特之兵亦较前气壮”，遂议将驻藏两千川兵裁减至五百，驻察木多一千滇兵“原为救援藏兵而设，今驻藏之兵既已酌减，则此项兵亦应撤回五百名，照四川兵丁之例，三年更换”。^⑩直到雍正十二年八月驻察木多滇兵全议撤回，^⑪后改由川兵单独驻守。

(三) 乾隆年间滇军预备入藏

经过“阿尔布巴事件”，清政府鉴于噶伦间易产生派系争斗，遂扶植平叛有功的颇罗鼐总揽藏局。乾隆十二年(1747)颇罗鼐病故，其子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袭爵，接管藏务，但他并没有继承其父对清廷的忠诚，妄图摆脱中央管辖而割据一方。乾隆十五年，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趁驻藏绿营兵内撤，公然发起反叛。谋叛之初，乾隆帝曾令云南提督冶大雄会商川督策楞，预备进兵西藏事宜，后因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已被驻藏大臣设计正法，逆党大势已去，遂下谕滇省停止调

① 《清世宗实录》卷 61，雍正五年九月庚申，第 7 册，第 930 页；《云南总督鄂尔泰奏遵旨筹划进兵西藏事宜折》，雍正五年十一月十一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11 册，第 12 页。

② 雍正五年十月清廷收到颇罗鼐率部在后藏继续作战的报告，又获悉策旺阿刺布坦已死，准噶尔一时无力染指藏内，雍正帝大喜，认为这是天赐的出兵机会。参见《西藏办事大臣马喇等奏报颇罗鼐与隆布鼐交战等情折》，雍正五年十月二十九日，《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下册，第 1525 页；《云南总督鄂尔泰奏遵旨筹划进兵西藏事宜折》，雍正五年十一月十一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11 册，第 12—14 页。

③ 《清世宗实录》卷 63，雍正五年十一月癸丑，第 7 册，第 960 页。

④ 《云南总督鄂尔泰奏谢朱谕训海暨遵旨进兵西藏事宜折》，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三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11 册，第 240 页。

⑤ 《云南总督鄂尔泰奏报料理进藏官兵事宜并请敕部拨款协济折》，雍正六年正月初八，《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11 册，第 371—372 页。

⑥ 《云南开化总兵南天祥奏报颇拉奈擒获阿尔布巴隆布奈扎纳奈情由折》，雍正六年六月十八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12 册，第 700—701 页。

⑦ 《清世宗实录》卷 75，雍正六年十一月己巳，第 7 册，1120 页。

⑧ (清)倪蜕辑、李埏点校：《滇云历年传》，第 600 页。

⑨ 雍正《云南通志》卷 16《兵防》，第 93 页。

⑩ 《清世宗实录》卷 129，雍正十一年三月壬午，第 8 册，第 677 页。

⑪ 《西藏研究》编辑部编辑：《西藏志、卫藏通志》，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6 页。

兵,仅由四川派出官兵进藏料理善后。^①

乾隆五十六年廓尔喀第二次入侵后藏,一路进攻至日喀则,对札什伦布寺进行大肆抢掠,后藏形势危急。时在藏督办军务的四川总督鄂辉曾“飞咨富纲(云贵总督)挑兵二千名,由云南维西一路出巴塘赴藏”,但乾隆帝认为“时将届冬令”,即调滇军“亦不能穷追深入”,且为粮饷“掣肘”,遂谕滇军“暂缓起程,在彼预备”。^②十一月,孙士毅、鄂辉奏复称已暂停调发,此后滇省再未接到发兵文。师范在《滇系》中亦称“先于辛亥(五十六年)春,调滇兵会剿,观音山等处俱已设台,旋以滇远撤回”。^③云南虽最终未出兵,但以往川滇联合入藏的经验为此役提供了重要参考,如备战期间,乾隆帝令孙士毅仿照从前川滇旧案办理粮饷。^④次年战事结束后,六月“委粮储使陈公孝昇驻中甸,协办廓尔喀凯旋兵饷”,十一月完成任务回滇。^⑤

二、滇军入藏的后勤供应及行军路线

清廷对藏用兵平叛,路途艰险,大军行路困难,沿途民力困乏,后勤保障颇为不易。滇军在清廷统筹下入藏,以边地穷省,于后勤供应保障和沿途交通建设,仍举力而为,成效可彰。

(一)军需筹备和供给

三藩之乱平定后,各省财政饷权收归中央,统于户部,清廷对战时军需供给和奏销均做了严格规定。故罗尔纲先生称:“当是时,兵饷都由国家统筹统拨,疆臣不但不得擅动,并不得擅自筹划。”^⑥当时清制优待出征者,除支給官兵行粮外,“家口仍于驻扎处支給(坐饷)”。一些在口外条件艰苦地方的驻兵亦按出征例支給粮饷,“驱准保藏”时曾明确规定:“云南江外中甸、江内其琮喇普一带地方,虽归丽江土府管辖,米粮无从购觅,将提臣所带驻扎策应之兵,江外自阿喜过渡起,江内自塔城外,照征调出口例支給行粮盐菜银两。”^⑦

滇军入藏出征官兵粮饷供运主要靠前线随营携带和后方转运接济两种形式。为了行军轻便,随营携带部分主要由沿途各台站逐站预备,发放额数按设台远近支給,仅供进藏途中食用,故各台粮饷提前预备和后续按时转运接济尤为重要。具体而言,官兵粮饷主要从省府及迤西各地调仓米、库银集中转运至塔城、中甸、阿墩子等进藏沿线台站储备,并派驻专门的坐台官兵负责往返军队的粮饷支发以及运饷官兵的接济转运。如康熙五十七年备战期间,巡抚甘国璧曾奏请将蒙化等府州县应征折色改征本色,并酌量运储于鹤丽、永北等“通西要路”。^⑧后来护饷进藏的杜昌丁回忆沿途情形称:至崩达“有副将曹公维城率所部迎于道旁……时以护粮驻此”,至必免“有米存军台中,具领裹十日粮”。^⑨雍正元年率驻藏满兵返滇的吴纳哈亦称回程时,“该督抚于沿途各站,为我官兵备给了食物草料”。^⑩此后,雍正年间两次援藏军需筹备大

① 《清高宗实录》卷 377,乾隆十五年十一月乙卯,第 13 册,第 1170 页。

② 《清高宗实录》卷 1387,乾隆五十六年九月戊戌,第 26 册,第 625—626 页。

③ ⑤ (清)师范:《滇系·事略系》,光绪十三年云南通志局刊版影印本,第 57 页。

④ 《清高宗实录》卷 1387,乾隆五十六年九月庚子,第 26 册,第 629—630 页。

⑥ 罗尔纲:《绿营兵志》,商务印书馆 2017 年版,第 416 页。

⑦ 雍正朝《大清会典》卷 55《户部·兵饷·出征官兵支給》。

⑧ 《清圣祖实录》卷 277,康熙五十七年二月甲午,第 6 册,第 719 页。

⑨ (清)杜昌丁:《藏行纪程》,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第 49、53 页。

⑩ 《江宁副都统吴纳哈奏报自藏撤兵返抵云南日期折》,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五日,《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上册,第 381 页。

体是按康熙末年旧例来调整筹备的。

表 1 康雍年间滇军入藏部分督饷官员信息表

事由	督饷官员	资料来源
驱准保藏	按察使金起复总运;督运文员赵州州牧迺西道白洵、武员副将曹维城(驻崩达台)	(清)倪蜕辑、李埏点校:《滇云历年传》,第 565 页;(清)杜昌丁:《藏行纪程》,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第 49 页
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	开化府同知丁栋成总理随营粮饷;大理府通判顾朝俊、宁州知州梁衍祚、江川县知县杨绳武办理接续粮饷及中甸阿墩子兵米支放	《云贵总督高其倬奏报提臣郝玉麟带兵前往察木道日期折》,雍正二年二月十八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2 册),第 611 页
平定阿尔布巴之乱	进藏督饷:随军粮饷由开化府知府丁栋成总理、楚雄知县李文炯协理,阿迷知州毛振翎驻昌都发饷 省内:剑川、中甸、阿墩子等处分别由永昌道贾扩基、剑川州知州杨正辅、大理府通判顾朝俊督饷	《云南总督鄂尔泰奏报料理进藏官兵事宜并请敕部拨款协济折》,雍正六年正月初八,《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11 册,第 378、381 页

为了保证饷权操于中央,防止官员贪污,顺治年间就制定了各省军饷造册报部奏销制度,雍正四年又进一步规定,“凡有军需紧要事务,该督抚须应将办理之州县预期筹划,酌量应用银两数目,一面报(户)部,一面在于存库银内发各该州县备办供支”,待事毕后再统一造册报户部奏销。^①由于相关军需奏销册的缺失,很难统计滇军历次援藏的各项军需实际耗费,但雍正六年云贵总督鄂尔泰向清廷报备的军需预估方案,为我们了解康雍年间的筹备情况展示了更多的细节。

根据鄂尔泰所述,整个军事行动涉及人员包括入藏大军、坐站官兵、运饷官兵三个系统,每个系统所需物资主要包括口粮、盐菜银、赏银、驮运脚价、马匹买补养护费用等项,各项耗费预计需银六十万余两;当时滇省司库存银仅四十七万九千余两,显然不够敷用,鄂尔泰只能奏请在两湖调协饷银五十万两运滇备用;粮食调运及仓储方面,从鹤庆府仓米调五千石、剑川州仓米调三千石,共八千石运至后勤基地中甸,再由中甸逐站转运四千石至阿墩子、一千石至察木多,后来又从阿墩子增运一千石至察木多;此外,还有雍正五年驻察木多滇军交呼图克图保管的米一千三百石。^②

滇军入藏军事行动所需浩繁,官兵之粮饷及所用器械、马匹、帐房、口锅、皮衣等项主要是造册交户部拨正项报销,^③而战时动用各类钱财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没有纳入正项报销,需由地方财政承担。如后勤系统的设立和维系就主要依靠滇省自筹,丽江府金沙江沿线设站运米乃“动支历年存库银两,给发各项费用”,^④安宁至九河驿站之夫马工食费用则“令各官捐设”,康熙末年及雍正二年的护饷官兵盘费亦由官员“俸工抵补”。又如领兵都统、提督及经理粮饷官

① 雍正朝《大清会典》卷 55《户部·兵饷·奏销兵饷》。

② 以上数据参见《云南总督鄂尔泰奏报料理进藏官兵事宜并请敕部拨款协济折》,雍正六年正月初八,《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11 册,第 371—383 页。

③ 《云南提督郝玉麟奏报驻扎中甸情形折》,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一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2 册,第 521 页。

④ 雍正朝《大清会典》卷 55《户部·兵饷·转运军需脚价》,第 53 页。

员行军途中所必需的赏号、财物等费用最后也只有由滇省归公备用银垫支。^① 雍正六年时,滇省盐务羨余零星银仅余一万两,也被征用为进藏军需中不能正项报销之项目。^② 实际上,滇军入藏过程中能以正项报销的部分非常有限,各项繁杂费用主要取于地方财政,地方官员为此东拼西凑,疲于筹措。雍正初年清查滇省财政亏空时,发现康熙末年滇兵入藏军需最终造册上报户部“通共奏销银三十九万五千两”,包括官兵俸饷 3.8 万余两,豆草项 35 万余两。^③ 而挪用或借支地方钱财的数目远超过正项报销部分,由此导致康熙五十八年至六十一年间滇省财政严重亏空。^④ 为了追补亏空,云南巡抚杨名时奏请以“通省俸工银两捐补还款”,据他统计,康熙五十六年起至五十八年止捐补过军需银 11.12 万余两已经扣抵,尚有五十九年至六十一年止还应捐军需 40.238 万余两,计划“以雍正三年为始,按年捐补归款……督抚给以半俸养廉,齐膳禁卒等役给以一半工食,其余州县以上各官俸工尽数捐抵还款”,约每年捐抵 4 万余两,至雍正十一年方能完清。^⑤ 捐俸是康熙中后期地方筹措军费的重要手段,陈锋指出:“就裁俸或捐俸而言,是清廷取之于官吏,上司取之于僚属,官吏取之于百姓。”^⑥ 滇军入藏一次动辄耗银几十万两,中央将大部分军费压力转移到地方,最终累及的仍然是社会底层百姓。尽管如此,云南举全省之力筹措军需支援滇军入藏,维护国家统一和边疆稳定的历史作用仍值得肯定。

表 2 雍正六年云贵总督鄂尔泰奏报滇军进藏军需各项银钱统计表

人员	进藏官兵		坐台官兵	运饷官兵	
	绿营官兵及跟役 3156 名	土、番官兵及跟役 268 名	官兵及跟役 449 名	官兵及通事 208 名	督饷文员
行粮 ^⑦	本色支給两个月:绿营:鹤庆剑川二仓十日、中甸仓十日、阿墩子仓四十日;土番:丽江、中甸仓各十日,阿墩子仓四十日		本色按设台远近由剑川、中甸、阿墩子各仓就近发放	同进藏官兵	进藏文员赏钱盘费共 6200 两;跟役二十七名照官兵例发放二个月口粮,六个月折银 648 两
	折色支給六个月共 75,744 两	折色共 6432 两	折色支給 10,776 两	折银共 5304 两	
	盐菜银共 33,249.6 两	盐菜银计共 2844 两	盐菜银共 4687.2 两 另按旧例每台乌拉 2 名,工食等项共需银共 840 两	盐菜银共 2268 两 另通事饷银、盐菜、马匹、赏银各项共需 596.4 两	

① 《云南总督鄂尔泰奏报料理进藏官兵事宜并请敕部拨款协济折》,雍正六年正月初八,《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11 册,第 375、380、381 页。

② 《云南总督鄂尔泰奏报盐务零星银两发充公用折》,雍正六年三月二十八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12 册,第 79 页。

③ 《云贵总督高其倬奏遵旨查复毛文铨为粮饷料草被参实情折》,雍正三年四月初二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4 册,第 710 页。

④ 陈锋:《清代军费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58 页。

⑤ 《云南布政使常德寿奏报滇省扣捐抵补军需情由折》,雍正四年七月二十六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7 册,第 775 页。

⑥ 陈锋:《清代军费研究》,第 357 页。

⑦ 行粮即口粮和盐菜银各计一年发放,其中口粮按本色、折色各六个月发放,本色由官兵随营裹带两个月,以供进赴察途中食用,接济运送四个月(由四川解运供给);另折色给付六个月,每月折银 4 两,由本省接济运送;盐菜银随营携带两个月,接济运送十个月。另建制外的土、番兵按绿营兵例,口粮盐菜银均由滇省筹备解运。

官兵赏银	各级官兵共 59,480两	按绿营规制发 给,共 5320 两	按进藏规格折 半,共 4840 两	共 4280 两	省内督饷文员赏银 共 3600 两
马匹 ^①	官兵需 4500 匹 6750;驼炮另需 120 匹,买补银 共 69,300 两	100 匹,买补银 共 1500 两	420 匹,买补银 共 6300 两	315 匹,买补银 共 4725 两	
共计	237,773.6 两		27,443 两	27,621 两	

备注:此外还有鞍架钱:马共 5467 匹,需银 2733.5 钱;运米脚价:八千石脚价共 44,400 两;运银进藏脚价共 10,700 余两;安宁至九河驿站工食料草银共 3635 两;驻察木多、进藏另预备军需银共 15 万两,剑川库备银 10 万两。以上各项共计需银 60 万余两。

资料来源:该表据《云南总督鄂尔泰奏报料理进藏官兵事宜并请敕部拨款协济折》,《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11 册,第 371—383 页统计得出。

(二)进藏交通建设

为了方便行军运饷,滇军入藏、驻藏期间,云南安设了从省府至藏(昌都)沿线的台站,包括安宁至九河或塔城的临时驿站及阿喜或塔城至藏的马台(又称军台),驿站设于滇省内地,每站配马六匹、马夫三名,负责递送紧急公文;马台主要设于金沙江口外,有专门的坐台官兵驻守,每台设兵十名、驮马十四匹及乌拉二名,负责粮饷、公文递运。据雍正《云南通志》所载,“迤西原未置驿,旧设堡夫久已逃亡过半,康熙五十九年满汉官兵进征西藏始设安宁(至九河)等一十七站,每站设马六匹,雍正七年师旋裁撤,八年驻兵查木道又复安设,十二年师旋仍裁撤”,过九河后“达阿喜另设马台至藏”。^② 又据《清实录》康熙五十九年,云贵总督蒋陈锡曾奏准添设从安宁至塔城的驿站共二十一站,^③此与《云南通志》所载似有矛盾。实际上,当时云南一路官兵经滇西北进藏有两条路线:省府设站至九河后,可分走“江外”(金沙江)由阿喜出口,或“江内”由塔城出口。雍正年间滇兵进驻昌都基本遵循康熙末年旧例安设台站。如雍正六年鄂尔泰就奏称拟按前两次进藏旧例,设安宁至九河的十七站及阿喜至昌都四十二台。^④

(三)行军路线

清代倪颯在《滇小记·站程》中记载,丽江府“西出有(金沙)江内、江外及危习等三路,而三路内又各有分投之路”。^⑤ 道光《云南通志》所记载经滇西北进藏有“自中甸由崩子兰天柱寨至西藏”“自塔城关至西藏”及“自维西至西藏”三路,^⑥该三路即分别对应倪氏所称“江外”“江内”及“危习”三路。关于这一时期滇军经滇西北进藏的路线,康熙末年随蒋陈锡运饷进藏的杜昌丁对行程有逐日记载。杜氏从昆明出发至剑川筹备运饷兵马途中,康熙六十年武格率部凯旋至剑州,蒋陈锡曾询问进藏路况,得知“自中甸进藏有两路,由天竺寨、叉木多一路,道宽而远,多夹坝(匪盗),高山大川,为滇蜀会兵孔道;由卜自立(奔子栏)、阿墩子、擦瓦、崩达、洛龙宗一路,高坡峻岭,鸟道羊肠,几非人迹所到,然颇近,五公(即武格)凯旋,所由遂走阿墩子”。^⑦ 后

① 马兵每二员给五匹,步兵二员合给三匹,马匹主要由省内各营抽调,买补银每匹十五两。见同折第 374 页。

② 雍正《云南通志》卷 6《邮传》,第 37—38 页。

③ 《清圣祖实录》卷 288,康熙五十九年七月丁卯,第 6 册,第 806 页。

④ 《云南总督鄂尔泰奏报料理进藏官兵事宜并请敕部拨款协济折》,雍正六年正月初八,《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11 册,第 374—376 页。

⑤ (清)倪颯:《滇小记·站程》,和生弟、王水乔主编:《大理丛书史籍篇》卷 6,云南民族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547 页。

⑥ 道光《云南通志稿》卷 106《武备志·边防》,道光十五年刻本,第 8 页。

⑦ 杜丁昌:《藏行纪程》,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第 41 页。

来杜氏从洛隆宗(今西藏洛隆县东)原路返滇途中又遇到再次领满兵进藏的武格。^①也就是说,当时滇军第一次进藏经“江内”走“塔城—察木多”一线外,杜氏随蒋陈锡运饷、武格凯旋及其第二次率部入藏均经“江外”走“中甸—洛隆宗”一线。其具体线路如下:

剑川—阿喜渡(渡金沙江)—咱喇姑—桥头—黄草坝—螺蛳湾—十二阑干—一家人—拖木郎—小中甸—箐口—大中甸—汤碓—泥西—行多—桥头(渡金沙江)—奔子栏—杵臼—龙树塘—阿墩子—多目—桥头(渡澜沧江)—梅李树—甲浪—必免—喇嘛台—煞台—多台—坝台—临米—江木滚—札乙滚—热水塘—三巴拉—木科—浪打—乌雅—宾达—烈达—擦瓦冈—天通—塔石—崩达—雪坝—波学—鲁体南—瓦河—马里衣—晓叶桑(渡怒江)—洛隆宗,送行至此,杜氏由原路返回。^②

由此可知,杜氏一行经过滇西北时所走路线应为倪书所称“江外”一路。据张钦考证,雍正元年驻藏满兵返滇,雍正二年郝玉麟率部进驻察木多,及毛振翎《西征记》《半野居士集》所载雍正六年滇军进驻察木多可能亦由杜氏所走路线。^③此外,雍正五年鹤丽总兵张耀祖领驻察木多滇军内撤时,“由擦哇岗过大雪山、溜筒江、阿墩子、奔子栏、中甸渡金沙江带兵进口”。^④可知张耀祖一行亦由“江外”路返滇。

而杜书所称“滇蜀会兵孔道”,即康熙末年大军进藏路线,应与《滇小考》载“江内”及道光《云南通志》载“自塔城关至西藏”线路所对应。关于此线具体走法,大体经剑川—石鼓—茨科—巨甸—塔城(五站)—奔子栏(三站)—阿墩子(三站)—天柱寨(三站)—毛佉公(五十四站)—西藏。^⑤“毛佉公”经郭大烈先生考释,认为在今昌都左贡一带。^⑥

综上,这一时期经滇西北行军运饷进藏路线,除康熙末年大军进藏走“江内”一路(石鼓—巨甸—其宗—塔城—喇普—奔子栏—阿墩子—天柱寨)外,滇军入藏往返主要走“江外”一路(阿喜—小中甸—中甸—奔子栏—阿墩子—天柱寨)。这主要可能缘于“江外”一路行军路程如杜氏所言“然颇近”有关。

三、滇军入藏与区域发展格局的变动

滇军参与清廷历次平定西藏“内乱外患”的军事行动以及进驻昌都,是清廷治藏总体战略布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滇军入藏支援的作用远不止于此,其更深远的影响还表现在滇军入藏成为建设滇藏之间交通,增强滇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升王朝边疆治理能力的重要载体。滇军入藏支援平叛“十余年来,官兵往返其间,崇岭鸟道,尽属坦衢,紫服穷陬,咸沾德化”,^⑦这为改善交通促进滇藏贸易、加深滇藏之间民族交往开创了新的历史条件。

① 杜丁昌:《藏行纪程》,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第54页。

② 张钦:《〈藏行纪程〉所载滇藏交通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1期)根据《藏行纪程》中往返程对该线路进行了部分增补,并对部分顺序误记的地方进行了考证,该文考证多可取,故本文采用的是张钦考订更正后的路程线路。

③ 张钦:《〈藏行纪程〉所载滇藏交通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1期。

④ 《云南鹤丽总兵张耀祖奏报遵旨带兵回汛并请陛见折》,雍正五年二月十三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9册,第98页。

⑤ 道光《云南通志》卷106《武备志·边防》,第8页。

⑥ 郭大烈、和志武:《纳西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293—294页。

⑦ 《西藏研究》编辑部:《西藏志、卫藏通志》,第37页。

(一) 滇军在清代军事治藏中的地位

纵观滇军直接参与的康熙、雍正两朝对藏军事行动,从各路大军的兵力对比及作战情况来看,主力主要由北路的陕、甘等省承担,川省次之,滇省则处于辅助地位。清前期的治藏策略中很重要的两点是安抚蒙藏和防备准噶尔,而在“地方军事上的重要任务主要是防御其西北、北部的准噶尔部侵扰”。^① 陕、甘等省在北防准噶尔,南安蒙藏中的地缘战略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北路大军在清廷防淮安藏军事布局中的前沿和主力地位。而南路川、滇两省的侧重点则为“安藏”,其主要作用是维系川滇藏毗连地区的稳定,在“驱准”“防准”上处于辅助地位,历次南路进藏的滇军战事并不多,在实际征战中主要是策应作战。具体来看,滇军除康熙末年进驻拉萨外,雍正初年两次入藏均止步于喀木,其主要任务是防止叛军侵扰康藏,或作为机动部队援助拉萨驻兵。清廷驻藏兵丁主要从四川绿营中挑选“以防准噶尔贼夷侵犯而设”,而驻昌都滇军又“为救援藏兵而设”。^② 雍正九年八月,清廷获颇罗鼐奏报“准噶尔欲送回拉藏之子苏尔杂,立为西藏汗”,该消息令雍正帝格外紧张,他担心准噶尔故技重施,假护送之名,行侵藏之实,他随即令驻藏官兵加强防守,并飞调“叉木多驻扎之云南兵一千名,令其前往西藏备用”,令驻军将领接旨后“即速起身”,“不必候云南文书”,所需各项物资均“宽裕应付,毋得迟误”。^③ 从后续情形看,此次调滇军进藏是虚惊一场,但滇军在应对藏内突发事件中的机动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滇军历次参与对藏军事行动,使清廷上下更加认识到川滇藏毗连地区联防治理对王朝治藏和安藏的重要性。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后,年羹尧就向清廷提出“西海善后事宜十三条”,其中就重点建议毗连西藏的川、滇、青各省应在各要地驻兵设防互成犄角之势。^④ 由此云南绿营兵在滇西北中甸、阿墩子、维西等地的重点布防,也就成为滇军入藏之后清廷在整体治藏格局中进一步重视滇军及滇省的直接体现。

(二) 滇军入藏促成了川滇协力安藏格局的形成

前面讨论了滇军及滇西北防务在清中前期安藏和治藏中的地位,但滇省或滇军的作用发挥,是在与川省的相互配合中实现的。如南路大军援藏、川滇藏毗连地区的划界及设防都由川、滇两省共同推进和落实。

康熙末年用兵西藏时,年羹尧就考虑到“三塘”(巴塘、里塘、绛塘)地区原系丽江土司辖地,且由中甸进藏至巴塘较四川更近,故向清廷建议“必用云南之兵与四川合势……惟滇蜀两路合势则军威自信”。^⑤ 出于历史因素和地缘关系,年羹尧制定了“滇蜀两路合势”的用兵战略,此后雍正年间南路清军进藏均遵循此惯例。在用兵过程中,相关事宜皆由双方军政大员协商落实。罗卜藏丹津谋叛时,雍正帝就命云贵总督高其倬“西藏兵马之预备,一切调遣”,均要与川陕总督年羹尧商酌而行。^⑥ 平定阿尔布巴之乱时,两军在昌都会师后,川军进驻拉萨,滇军则

① 孙宏年、苗鹏举:《清代西藏地方军事地理格局的演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3期。

② 《清世宗实录》卷129,雍正十一年三月壬午,第8册,第677页。

③ 《清世宗实录》卷109,雍正九年八月乙卯,第8册,第456页。

④ 《陕总督年羹尧奏陈西海善后事宜十三条管见折》,雍正二年五月十一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册,第34、39页。

⑤ 《四川总督年羹尧奏为再陈进兵西藏兵数等情折》,康熙五十八年正月十三日,《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8册,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

⑥ 《云贵总督高其倬奏筹备滇藏边境防务折》,雍正元年四月初五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第1册,第218—221页。

坐镇昌都，“遥为犄角”。^①此外，两军进藏、驻藏过程中还相互接济粮饷。如雍正六年滇军进驻察木多，四川为其接济四个月口粮。^②乾隆五十七年平定廓尔喀时，因“蜀台缺饷，咨滇采买”，由云南粮储道陈孝昇赴中甸筹办，据随陈备粮的师范称，当时先调支云南兵米陆续赶运，再按市价购米归还各仓，故粮饷得以速运，“运抵昌都，恰值师还”，陈、师二人因此得到朝廷嘉奖。^③

康熙、雍正年间，川滇联军入藏平叛过程中，逐步廓清了和硕特蒙古对滇藏川毗连地区的影响，并最终明确划定了川滇藏之间的省域行政界限。区域行政界线勘定，“充分考虑和兼顾了藏区实际情况和行政管理的便利性”，^④云南由此进一步加强对滇西北的控制。雍正五年鄂尔泰奏请建立维西大营，滇军在滇西北进藏要线的驻防点正式纳入建制，与川军在川边地区的军事布防得以遥相呼应。川、滇军“挽运兵粮互相接济”，^⑤军事布防互为“犄角”之势的协同安防局面初步形成。

需要指出的是，川滇两省协同安藏过程并非“一拍即合”，其间还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省际利益冲突和矛盾。清初，被蒙古和硕特部逐出川滇边区的丽江木氏土司意图恢复对“三塘”地区的控制，力陈巴塘等地与滇省之历史渊源，滇督蒋陈锡遂借机上疏请将“三塘”仍归丽江土府，清廷初允。^⑥但川督年羹尧上疏以方便行军为由，请将巴塘、里塘暂归四川。^⑦巴塘之争为后来的云南误粮案埋下了伏笔。两军会师时，滇饷迟延，川督年羹尧藉以滇饷迟误弹劾蒋陈锡，清廷以蒋陈锡、甘国璧二人贻误军机，“俱著革职，令自备口粮，运米进藏”。^⑧对于云南“误粮”的原因，川滇双方各有说辞，云南辩称“误粮”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四川方面有意阻挠，^⑨四川则奏称木氏土司“杀良阻运”，致巴塘运路堵塞。^⑩而此案发生的根源是滇川藏交界区行政归属不明确，巴塘等地又因战略位置重要而成为各方争夺的“要紧之地”有关。故木芹先生评论此案发生“最本质的原因还在于丽江土知府扩张其自己的势力范围，四川统治者亦图扩大其统治范围，而藉此发作罢了”。^⑪

我们强调康熙年间的“误粮案”，并非为了重现历史矛盾，而是为了突出川滇同心协力之重要。而历次滇军顺利入藏并发挥作用，川滇之间摒弃前嫌、协同共济局面的形成，无疑都与清廷治藏治边能力和总揽全局的把控能力分不开。换言之，川滇能否和谐一致，不仅事关军事行动的顺利开展，还与中央政府有效治藏之决心和能力有重大关系，而坚强有力的大一统政治格

① (清)毛振翮：《西征记》，方国瑜主编，徐文德、木芹、郑志惠纂录校订：《云南史料丛刊》第12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4—185页。

② 《云南总督鄂尔泰奏报料理进藏官兵事宜并请敕部拨款协济折》，雍正六年正月初八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1册，第373页。

③ (清)师范：《滇系·典故系·乌斯藏说》，第61页。

④ 黄辛建：《雍正时期藏区行政区划研究》，《中国藏学》2018年第3期。

⑤ 《陕总督年羹尧奏陈西海善后事宜十三条管见折》，雍正二年五月十一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册，第39页。

⑥ 《清圣祖实录》卷287，康熙五十九年二月甲子，第6册，第799页。

⑦ 《清圣祖实录》卷287，康熙五十九年四月壬寅，第6册，第800—801页。

⑧ 《清圣祖实录》卷289，康熙五十九年九月戊寅，第6册，第812页。

⑨ (清)倪蜕辑、李埏点校：《滇云历年传》，第566—567页；张永康、彭晓主编，云南省博物馆供稿：《木氏宦谱·图谱》，第134页。

⑩ 《清圣祖实录》卷290，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丙子，第6册，第819页。

⑪ 方国瑜主编，徐文德、木芹、郑志惠纂录校订：《云南史料丛刊》第12卷，第180页。

局则是统筹各方,保证川滇协同安藏的根本前提。上述“误粮案”未扩大事态,也未影响川滇合力大局,其主要缘由也正在于此。

(三)滇军入藏成为促进滇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纽带

滇军进藏过程中安台置驿,有效改善了滇藏之间,特别是滇西北地区与云南、四川内地之间的交通条件。如“迤西原未置驿,旧设堡夫久已逃亡过半”。^① 为了应对滇军入藏之需,如前所述,清廷开始重新加强滇藏通路沿线交通建设。滇军三次入藏支援,大军沿途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为滇藏间通道的畅行无阻,重新扫清了道路上、安全上的障碍。雍正年间滇军两度驻防察木多,驻兵时间长达十年之久。察木多有两桥,一曰“着桥”在昂褚河上,通云南;一曰“杂桥”在杂褚河上,通四川。^② 当时清廷曾派拨川滇兵协同保护当地呼图克图,“嗣因川、滇制兵时起冲突,遂将两省之兵,分守两桥,故有今称之四川桥、云南桥名词也”。^③ 川滇藏边区安防改善,商旅安全得以保障,嗣后,到察木多贸易的“蜀商滇客,辐辏而至,汉彝杂处”。^④ 雍正十年有进藏官员见察木多“坡下建营垒,列市肆,为西(维西)属南滇大兵驻防之所”,^⑤到乾隆年间滇军虽已撤回,但“城外寨落甚稠,滇民贸易者不少”。^⑥ 滇军入藏和驻藏,不仅为康藏地区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还有力促进了滇藏之间的经济交流和民族交往,打开了清代滇藏贸易活跃发展的新局面。^⑦

滇军往返滇藏边区,与当地民族有诸多直接接触和互动,促成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互识与认同。如康熙末年清军运饷进藏途中发生火劫,蒋陈锡等人出资救济灾民,沿途各民族民众和营官听说善举后,纷纷主动为进藏官兵提供食宿,并协助运饷。^⑧ 进军途中一些主动归顺和协剿有功的土目、头人还被清廷授以土外委、守备、千把总等职,^⑨军民互动间加深了彼此的理解和认同。滇军入藏还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滇藏边区的移民流动和民族融合。郝玉麟领兵进藏,“有兵丁落籍中甸”,金沙江撒苏碧村的黄氏就是当时援藏清军的后代,其先祖黄宝因“随同督部堂郝抚征西藏有功,奖以部主之职,因卜此地而居焉”。^⑩ 中甸明确归滇后,为减轻驻军昌都及中甸带来的军饷压力,高其倬还派官员至中甸查找耕地,拟“仿屯田之意开垦”,经调查发现“中甸之东四十里外有沿江平川一道可以种麦,亦有可以开成水田之处”,后经高其倬奏准开始在中甸募民开垦。^⑪ 雍正六年滇军入藏时,“驻军中一部分回族官兵落籍于中甸,同期,一部

① 雍正《云南通志》卷6《邮传》,第37—38页。

② 雍正《四川通志》卷21《西域》,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4页。

③ 王廷选:《昌都历史述》,赵心思、秦和平编:《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上册),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442—443页。

④ (清)毛振翮:《西征记》,方国瑜主编,徐文德、木芹、郑志惠纂录校订:《云南史料丛刊》第12卷,第184页。

⑤ (清)王世睿:《进藏纪程》,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第65页。

⑥ (清)林僑:《西藏归程记》,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第105页。

⑦ 周智生:《商人与近代中国西南边疆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0页。

⑧ (清)杜昌丁:《藏行纪程》,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第43页。

⑨ 参见光绪《新修中甸志书稿本·土司志》,徐丽华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汉文版),第88册,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22—23页;《云贵总督高其倬奏报中甸情形折》,雍正二年二月二十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册,第520页。

⑩ “金沙江萨苏碧村黄氏碑墓序”,载云南省中甸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中甸县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220页。

⑪ 《云南总督高其倬奏中甸田地可开垦折》,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九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册,第881页。

分回族商人由大理进入中甸开矿、经商”，今三坝乡回族多为这些人的后裔。^①今天的德钦汉族最早亦可追溯到康雍年间的滇军入藏，当时“有少数兵丁及随军入藏者留居升平镇，又有丽江木氏土司随军西征的士兵留守、旅居升平镇，与土著藏民杂居”，后来在附近发现矿藏后，才陆续有其他汉人迁入。^②“今丽江沿金沙江的河谷地带，为清王朝设置汛塘守卫通往康藏的大道，这一河谷地带的许多梯田和山地，就是当时汛塘驻兵与当地民户开垦出来的”。^③方国瑜先生在丽江金沙江一带对该地汛塘实地考察后说：“此等民户，原是统治者布置弹压边境，而大都穷苦人民。驻防以后，开山地，辟农田，修道路，兴水利，建村舍，生息于此，成为乐土也。”^④乾隆年间，据传云南参军彭元辰押着二百驮饷银从云南到拉萨，在翻越昌都边坝丹达山时因护饷不幸遇难。^⑤后人考证说，这位云南运饷军官就是后来广为汉藏民众崇信的“丹达山神”原型。^⑥

由此而言，滇军入藏支援平乱，在清代边疆治理开发和促进滇藏关系发展等多个方面确实起到了“秘奥既启，利用突增”^⑦的先导作用。

四、结 语

清代统筹治藏得以实现，边疆省际之间的互动和支持无疑是其中重要的支撑条件。滇军三次入藏支援平乱，充分体现了边疆治理中省际互援的重要性。同时，也说明在边疆治理史和族际交流史研究中，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对边疆跨省际交流互动发展史的关注，才能更好揭示出边疆各地各民族凝聚发展的历程及其多样态保障路径。此外，正如本文中所讨论指出的，无论是清代滇军得以协同川军入藏平乱，还是滇藏之间各民族跨省际交往交流关系的深化和加强，其根本在于清代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建构和治理体制的有效运行。民国初年川滇在联合入藏问题上内讧不断，而民国中央政府无力协调，导致川滇协同平定藏乱无法实现，而且由此致使川滇藏边区陷于长期动乱之中。^⑧清代川滇协防统筹治理安藏与民国初年川滇藏边区战乱不息的乱象，固然有时代变化之不同，但鲜明对比中也明确昭示着国家整体治理体系建构和有效运行，无疑对于维系边疆安定具有基础性作用。

〔责任编辑 贾 益〕

① 云南省中甸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中甸县志》，第213页。
② 德钦县志编纂委员会：《德钦县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22、76页。
③ 纳西族简史编写组：《纳西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4页。
④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下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230页。
⑤ 李旭：《遥远的地平线》，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9页。
⑥ 王川：《清代及民国时期西藏地方的丹达神崇拜》，《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1期。
⑦ 任乃强：《论边腹变迁与西康前途》，《任乃强藏学文集》下册，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76页。
⑧ 孙宏年：《民国初年滇、川、藏之间关系及其影响——以西藏治理和西南边疆稳固为中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